

摹繪文派絕代風華：《桐城文派史》的學術價值

王思豪 劉智毅¹

摘要：桐城派作為有清一代最大的學術流派，雄踞清代文壇二百餘年，以一千三百多人的學者群體和極為豐富的文章創作與學術理論建構稱名至今。在現有的文學史框架下，為文派自身“修史”的學術嘗試非常罕有。文派之歷史，不止是表面上一眾文學家作品和思想的羅列，還有深藏在作品理論之下的內在關聯，比如作家的成長史、教育史、閱讀史，作家群體之間的交際、爭論、合作與齟齬，不同派系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桐城文派史》體現了將文派研究與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相結合的思路。全書依託扎實的史料文獻和多元的史學視角，為中國重要的古典散文流派“桐城派”譜寫了屬於文派自身的文學史。此書對桐城派的發展脈絡進行了詳實深入的梳理考據，回顧了近百年來桐城派研究的學術成果，在桐城派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關鍵詞：桐城派；文派史；學術史

三大家廿年賦寫桐城一邑神韻，八分期九章摹繪文派絕代風華。江小角、方寧勝、朱楊三位學者，歷二十餘年精心力撰《桐城文派史》²（以下簡稱“《文派史》”）終於問世了。此書裒集浩繁史料，對桐城派在各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學創作和文論思想進行了細緻的梳理考察。《文派史》的歷史呈現是精彩且深刻的，既從狹義上勾稽了桐城派作家群體泱泱二百餘年的運行軌跡，也從廣義上展現了桐城派文學、桐城派文論和桐城

¹ 王思豪，男，博士，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劉智毅，男，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學。

² 江小角、方寧勝、朱楊：《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派學術“三位一體”的宏觀整體面貌。作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為桐城派“修史”的研究專書，《文派史》在學術層面的價值非常值得闡說。

一、文學史上的嘗試與建樹

桐城派作家大多工詩文，在學理上亦有己見，因此據一些學者的觀點，廣義上的桐城派應包含“桐城文派”“桐城詩派”和“桐城學派”¹。但由於散文是桐城派作家最重要的文體陣地，其文學理論也基本圍繞散文文體展開，因而將“桐城派”等價於“桐城文派”也是目前學術界通行的觀點。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文派現象自古有之，針對文派的研究亦始終是古典學術中的顯學。在現有的文學史框架下，文派往往作為特定時期文學史的現象而被討論，為文派自身“修史”的學術嘗試非常罕有。《文派史》即體現了將文派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相結合的思路。

《文派史》在“修史”層面用力頗深。對桐城派的綜述性研究，本書並非首例。先行者如吳孟復先生晚年著作《桐城文派述論》，就已經對桐城派經典作家、派系以及散文特色進行了述評論考。而《文派史》顯然不滿足於綜述研究，編寫者以三倍於吳先生述論的篇幅為桐城派修史，在史料匯集、版本考證等方面都力求準確詳實。《文派史》列舉桐城派散文家中較有代表性的31人（未計算一些分支流派的作家），既考察戴名世、方苞、劉大櫟、姚鼐等魁英人物，也涵蓋了一些被傳統文學史所忽略，為精英作家盛名所掩蓋但文章實力不俗，在桐城派發展史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如吳敏樹、方宗誠、嶺西五大家等。全書在編寫邏輯上沿用傳統文學史的方法，將二百餘年桐城派的流行變遷劃分為濫觴、初創、發展、樹幟、鼎盛、中興、轉型和式微八個時期，對各個時期代表作家的生平、文論、散文藝術和學術思想做了詳細的介紹。這種介紹不是對作家傳記和文論的簡單堆疊——編寫者著意

¹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第1頁，黃山書社1989年版。

將桐城派作家放置在清代總體的社會政治與學術文化語境裏，力求厘清作家及其思想的形成邏輯以便讀者對其然和其所以然都有瞭解。例如，方苞文論主張“義法”，本書除闡發“義法”說的內容，還詳細介紹了“義法”說與清初崩亂之文風、戴名世振興古文之主張、萬季野等史學家之啟迪、《易》哲學思想的多重關聯，使得方苞的“義法”說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文學主張，而是一種其來有自的文學思想逐漸演進的結果。此外，《文派史》還對桐城派作家的發展譜系做了系統性鉤沈。桐城派歷二百餘年流行，在方苞、劉大櫟、姚鼐等主要文派人物之外，還蔓生出一批在當時文壇有一定聲名，對文派發展有重要意義的作家。這些作家或通過師門關係，或通過江湖情誼，圍繞在桐城派主要人物周邊，以近似的文學及學術主張構成桐城派的文統道統。《文派史》非常注重文派中人物譜系的整理，對作家群體之間通過交遊、拜師形成的紐帶進行了詳考。例如，陽湖派作為桐城派的支流，其誕生的一大背景即是劉大櫟弟子錢魯斯和王灼對惲敬、張惠言的引介。《文派史》理清了劉至錢、王，再轉到惲、張的譜系，為桐城派和陽湖派之間的關係繪製了清晰的圖譜。讀者不再是簡單接受桐城派的歷史外貌，而是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如何在文派的體系中成長，文統道統如何在多代作家的傳承中發展和演變。《文派史》的編寫邏輯雖不複雜，但這種內在譜系的建立，以及對相關瑣碎史料的考據發掘才是最見功夫的。

《文派史》的史學視角是多元的，在文學命題之外更關注到了桐城派的文化意義。其一，《文派史》對於文化地理學的思考反映出桐城派研究的新思路。桐城派是以地理名稱命名的文學流派，而安徽桐城這一文化圓心，在早期的桐城派研究中卻相對受忽略。大部分專著不探討“桐城”這一地理要素，而即使如吳孟複先生的《桐城文派評述》提到了桐城文派與桐城之關聯，也僅僅以一二頁篇幅略談桐城當地“讀書科舉仕宦”的民間風氣，以及桐城人對外交流之便利，但這些特質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不能解釋桐城

派與桐城地理之間的緊密關聯。人文地理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一種方向，近年來得到學界的關注。在桐城派研究領域，許多學者對地理因素與文人創作的關係都有所考察，如拙文《地理與學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辯》，即探析了桐城地理與桐城派文統道統之關聯¹。《文派史》充分汲取當代學術界的新思路，加意於桐城的人文地理變遷和桐城派作家的桐城書寫。例如第一章“桐城文派淵源”，除分析明清鼎革之際桐城地方文人群體的文學生態外，還特別單列“桐城文派作家筆下的鄉情與桐城理學”一節，對桐城地理的歷史推移和自然風貌作詳細介紹，通過地方縣誌、地方詩文選集、地方經濟文獻和知名人物圖譜，清晰勾勒出文化高地“地靈人傑”的面貌。《文派史》對文化意義上的桐城做了深入考掘，關於當地文教傳統和理學淵源的論述十分出彩。書中對桐城本地的書院和其他教育機構做考察，並統計桐城望族在科舉方面取得的成就，發現了家學、家族以及家族之間姻親交往對桐城籍作家成長的影響。這一研究證明桐城派的誕生與發展並非純粹的文學問題，而是一種地方鄉土與社會關係共謀而成的現象。桐城派在學術上推崇程朱理學，一般認為是受到方苞的影響。《文派史》通過查考《桐城縣誌》，發現桐城自明嘉靖以來就有非常深厚的理學教育傳統。

以方氏家族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大家在桐城講學著書，遂在地方形成一種遵奉宋學之學術風氣，而此種風氣恰好成為孕育桐城籍作家的大環境。這一探索也表明桐城派的學理主張並非作家個人好惡，而是有着濃厚的地方文化特色。通過對地方誌和資料集的細緻挖掘，《文派史》找到了桐城文化地理與桐城派文人的耦合點，讓桐城派的歷史建構不再限制於單純的作家作品研究。其二，《文派史》嘗試發現作家在文學以外的面貌。過往的桐城派歷史梳理，不僅局限在有限的作家群體上，還往往祇關注作家的文學身份。

¹ 王思豪：《地理與學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辯》，《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第166—178頁。

事實上，桐城派作家對有清一代文學、學術、社會文化的介入是全方面的，僅從文學角度看待桐城派是對這一文派影響力的低估。《文派史》在編纂過程中有意識拓展了桐城派作家的維度。例如，對於桐城名家方苞，書中除介紹其知名的“義法”說，還單獨介紹了方苞與程朱理學的關係，呈現了方苞對宋學的接受史，以及其作為宋學衛道士言辭激烈、有失斯文的一面，這在以往的桐城派歷史著作中是少有的。又，在介紹劉大櫟和姚鼐時，本書專門探討劉、姚對清代教育制度的影響，如劉大櫟在徽州居留十二年，通過問政書院培養出一批徽州本地文章大家，推動徽州區域文化交流；姚鼐在蘇、皖主持書院四十年，提出了非常體系化的人才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對書院管理制度多有貢獻，使得姚門弟子後來成為桐城派的中堅。《文派史》對桐城派文人教育經歷的關注，表明當代學界正有意識拓寬桐城派歷史的建構維度。文派之歷史，不止是表面上一眾文學家作品和思想的羅列，還有深藏在作品理論之下的內在關聯，比如作家的成長史、教育史、閱讀史，作家群體之間的交際、爭論、合作與齟齬，不同派系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文派史》建立在一套更有力的歷史研究方法論上，這也使得這部 1000 多頁，百萬字的人文著作不僅毫不枯燥，反而能為複雜繁冗的桐城文學史提供許多別有新意的切面和視角，為桐城派研究者帶來極為有益的學術啟迪。

二、學術史上的會通與超越

《文派史》的重要價值之一，在於對以往桐城派綜合性研究的會通與超越。

關於桐城派的學術研究大抵發軔於晚清至民國時期。此類研究以桐城派作家之詩文創作或文學理論為主，對於桐城派作為文派本身的歷史考察相對較少。以桐城派歷史為研究對象的系統性著作，有姜書閣先生的《桐城文派

評述》（1928），劉聲木先生的《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1929），吳孟復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論》（2001）等幾種。姜、劉二位先生的研究開展於20年代，大致處於桐城派受新文學撻伐，逐漸走向式微的時期。吳孟復先生晚年所作《桐城文派述論》汲取了20世紀中後期以來桐城派學界的研究成果，在史料廣度和學理深度上都有所進躍。總結來看，在過去近一百年，桐城派研究雖在文獻學、文體學、批評理論等領域積累了豐碩的成果，但始終缺少一種集大成的系統專書，用現代學術方法為文派建立起文學史的敘述話語。由此觀之，《文派史》的問世，無疑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

江小角等先生在桐城派研究領域深耕多年，《文派史》體現出編纂者集大成的學術展望。在史料匯集方面，《文派史》達到了目前桐城派文學史著作的最高高度。無論是姜先生的《桐城文派評述》還是吳先生的《桐城文派述論》，在介紹桐城派歷史時都沒有在文獻上做足功夫。姜先生評述篇幅僅百餘頁，所用史料有限；吳先生述論關於桐城派的內容不足二百頁，且其中歷史文獻均不知其所出，故而二者所作在今天看來更多屬於科普或評點性質。相比之下，《文派史》對桐城派史料文獻的挖掘可謂到了無所遺漏的程度。全書考輯古籍史料261部，大部分作家傳記和詩文集都經過編者或業內學者的重新勘誤點校，文獻可信度高，極大方便了學者的研究工作。依託扎實的史料匯集，《文派史》對於桐城派的學術命題能展開更大的闡釋空間。以文論為例。桐城派作家以散文名世，其文論觀點在古典文學理論體系中亦影響深遠。一般認為，桐城派文論的理論基石為方苞的“義法”說。以此為嚆矢，延伸出劉大櫟“義理、經濟、書卷”說，姚鼐“義理、考據、文章”說，姚瑩“義理、經濟、文章、多聞”說，方宗誠“義理、經濟、事實、考證”說，曾國藩“義理、辭章、經濟、考據”說等諸多變體。由於歷史久遠且師承關係紛繁複雜，桐城派作家雖有近似的“文統”，卻在具體的“文論”層面多有差異化的主張。與桐城派文論相關之研究，大多僅從單個作者的文學理論

開始考察。至於系統性探勘桐城派文論者——如賈文昭先生《桐城派文論選》曾遴選 46 名桐城派作家的文論進行評說——數量相對較少。《文派史》在建構桐城派文學史的過程中，將文論提升至與文學創作並重的高度。全書各章在梳理作家生平、詩文寫作、師門傳承之餘，都單獨設節，專門介紹作家的文論主張，幾乎做到了有人必有論，對桐城派文論的發掘細化到了一些相對邊緣的作家。關於方、劉、姚等名家的文論，前人之述備矣，因而《文派史》有意識地選取部分不太知名，但在文論上有所作為的桐城派文學家作為擴充。例如在介紹方苞時，特別考察了學界關注相對較少的方苞弟子王又樸和雷鉉，不僅陳紹二者的古文創作，還特地詳述兩人的文論主張，如王又樸脫胎自方苞，加上個人理解而產生的“文質論”（質之至者，文自生焉）、“立言有體”、“風雅之道源於性情”，雷鉉的“淳古沖淡”、與山川相映發等。這些作家的文論大多屬於方、劉、姚理論的變體，但對於桐城派文論史的完備頗有補充意義。其他人如王灼、管同、劉開、李宗傳、吳敏樹等，書中對其文論都有詳實細考的介紹分析。雖然選取的敘述對象仍然以名家大派為主，但從文獻的史料收集、填充和展開來看，《文派史》對桐城派史料的整合整理已經達到相當高的完成度。